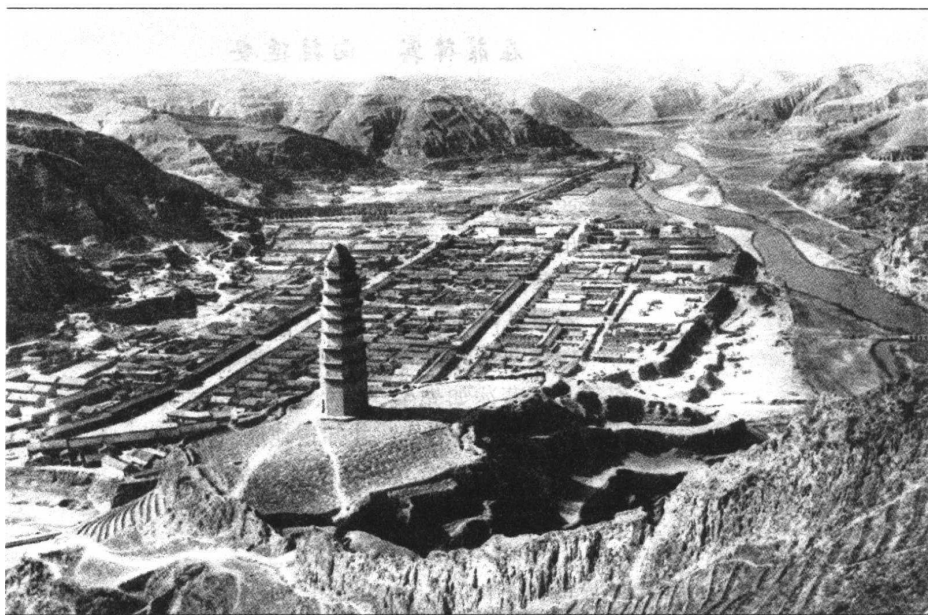


奔赴延安



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城

到延安的前前后后

白 刃 *

在菲律宾 向往延安

延安，中国革命的圣地，像一块大磁石，吸引着海内外青年，投进革命的洪炉里，锻炼成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在菲律宾，我就向往延安，像游子怀念母亲，希望早日投入她的怀抱！

1935 年，我在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。级任老师董冰如先生，是个矮矮胖胖的湖北人。（解放后重逢，我才知道他原名董锄平，1922 年的中共党员，曾参加大革命和南昌起义。）董老师在华侨中学，领导进步师生组织

* 作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员。主要作品有《白刃小说选》、《白刃剧作选》；长篇小说《战斗到明天》、《南洋漂流记》；诗集《野草集》、《前进的回声》；电影《兵临城下》等。

“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”。在董老师的培养教育下，我成了救国会的常委，参加编辑《救亡月刊》。1936年，董老师知道我一边读书，一边做工卖报，就把每期200份《救国时报》交给我推销，并嘱咐我不能像卖《华侨商报》和《前驱日报》那样沿街叫卖，只能半公开推销，卖不掉的可以送给进步的同学、工人或店员。

《救国时报》是在巴黎出版的，报上登了许多抗日反蒋的文章，也有中国工农红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消息。报上经常刊载王明的文章，王明名下括弧里印着陈绍禹。当时我不知道王明是何人，只对他同时用两个名字感到奇怪。到延安后才听说，这报纸是中共在巴黎办的，主编是吴玉章同志。

每期《救国时报》来了，我都贪婪地阅读，像吸水海绵，汲取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。这些理论变成《救亡月刊》的灵魂，我们常用它的观点，撰写自己的论文。

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，董冰如老师乘年假去香港，回来后对我们说：“国共又要合作了，今后要宣传全国一致抗日，不再反蒋了，要团结蒋介石的军队共同打日本。”

1937年1月号《救亡月刊》，我们发表了一篇《国共合作的一线曙光》的社论，我还写了一篇揭露汪精卫（西安事变后，汪匆忙从德国归来，曾路过马尼拉）勾结日寇和何应钦，阴谋进攻西安，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文章，登在同期的《救亡月刊》上。这一期，还用了一幅绥远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抗战的照片作封面，照片上两个士兵在阵地上握着机关枪向日寇射击。《救亡月刊》是16开铅印本，经费来源靠刊登广告和爱国华侨捐助。

不久，听说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总部移到延安。延安成为中国红都，成为抗日救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。

到延安去！一粒希望的种子在我的心中萌芽。怎么去？不知道，因为道路遥远，如何筹备回国旅费，回国后如何通过国民党

统治区到陕北，都没有把握，何况当时还有个对我很好的女同学，怎舍得断然离开！

这时候，我已经到了《华侨商报》编辑部当学徒。总编辑是江西人来远甫、福建人于以同（这两位先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、日寇占领马尼拉后被日军杀害）。每天晚上，我学习翻译合众社、路透社、哈瓦斯社……的英文电讯，有时和记者到警察局采访社会新闻，或到火灾、抢劫现场采访调查。从外电里，读到日寇得寸进尺，不但占领了东北四省，伪化了冀东，而且在北平城外丰台、廊坊进行军事演习，践踏祖国的土地，摧毁农民的庄稼。译电讯时，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，义愤填膺，恨不能早日回国，拿起刀枪杀敌人！

恰好有一天，叔父和两位同乡来到马尼拉，他们响应宋子文开发海南岛的号召，集资组织一个民生公司，想到那里种植热带作物。叔父说，他们不懂国语，不会说广东话，想叫我当翻译，旅费由公司负担。

我正愁着没有回国的旅费，便高兴地答应了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董冰如先生，他很赞成，并给海南岛的专员黄强写了一封介绍信。黄强原是十九路军的参谋长，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，董老师曾代表侨领许友超，到福建参加会议，和黄强有交情。

1937年3月初，学期考试完毕。一天下午，我提着小藤箱，乘马车到巴石河码头。为了不耽搁师友和同学们度暑假，我只在电话里向他们告别，没有说明开船时间，自然不会有人来送行。邮船缓缓离开码头，船上的乐队奏起《一路平安》的乐曲，旅客和送别的亲友，互相抛掷着彩色的纸带，双方各拉着一端依依告别，喊着“再见”。子然一身的我，对此情景，不由感到无限的惆怅！

轮船开出马尼拉湾，时近黄昏，晚霞映着海水，海鸥绕着白

帆，风光绚丽，景象迷人。我站在甲板上，任凭晚风吹拂，最后一次欣赏马尼拉湾的落日。望着越来越远的仑礼查公园，想到今生恐怕不会再到这异国来，禁不住伤感地哼起了《告别南洋》这首歌^①。

第二天上午风平浪静，轮船在太平洋上航行。我意外地发现董冰如老师站在上层甲板上，依着栏杆望着海洋。我高兴地跑上去。董老师说，他要回湖北，是临时决定的，想不到竟在同一船上。

船到香港，和董老师分手时，我问他今后如何联系，他给我写下汉口永安堂药房的通信地址。上岸后，我找到叔父住的客栈。几天后，乘船去海口。由于有黄强专员的介绍，我们来到濠县那大镇，花了几千银元买了一片荒山野林。抗战爆发后，民生公司没有派人去开垦，那片山林也就扔了。

到南京 救国无门

在海南岛前后耽搁了两个月，5月间，经香港乘船到厦门，遇到3个从马尼拉回国的青年，其中一个姓陈的同学，正在南京五卅中学读书，另外两个是店员。他们准备去南京，邀我同行。我当时充满了青年人的幻想，寻思去延安没有门路，不如先到南京碰碰运气。也许有机会转到陕北去，便答应了。

我回福建晋江县永宁老家筹备旅费。父亲原是旅菲华侨，十

^① 《告别南洋》是上海“一·二八”抗战之后，由田汉作词、聂耳谱曲的抗日歌曲。歌词是：再会吧，南洋！你海波绿，海云长，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。我们民族的血汗，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。再会吧，南洋！你椰子肥，豆蔻香，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。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，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。再会吧，南洋！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，血流着黑龙江。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！再会吧，南洋！再会吧，南洋！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！

几岁到吕宋当苦力，后来在怡朗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小杂货铺。1933 年小店倒闭，父亲心灰意懒，回家务农。他给我筹备了几十块钱，我返厦门和 3 个同伙搭船到上海，转乘火车去南京。

我们在南京丹凤街租了一间简陋的小楼房。陈同学回五卅中学念书，两个店员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，报考航空学校，体格检查时就被淘汰下来了。我想找个学校半工半读，但学校都是全日制，而且人地生疏，没有这个可能。我们 3 人像雾海中的孤舟，找不到航向，又不愿匆匆离开，便在这个国民党的首都“搁浅”了。南京真是个大火炉，才 6 月中旬，一清早就满身大汗。我们每天在南京街头游逛，到玄武湖躺在树下看书，消磨时光，等待奇迹。

奇迹出现了！7 月 7 日，卢沟桥的炮声，震撼着祖国大地，唤醒了被压迫的民族，渴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爆发了！我们兴奋地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喊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，希望投身到战地去。我们注意报上的广告，有个同伴想投考陆军士官学校，另一个动摇犹豫，我则坚决反对。末了，看到一则招收战地服务团的启事，一致同意去报名。报名处设在一座大庙里，门前冷冷清清，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，担保栏上写着孔祥熙。我们要报名，管事的要殷实商家担保。我对他说，我们为了打日本，从海外回来，南京无亲无故，哪儿去找铺保？我们出示了南洋的证件，管事的还是不同意，并且冷冷地说，现在汉奸到处活动，没有铺保不行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居然怀疑我们是汉奸！我们怀着满腔愤慨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

连日来，从北方过来许多难民，南京居民也惴惴不安。大街上经常出现一串串漂亮的小轿车，国民党的要人们正在开什么会议。两个同伴看到救国无门，一肚子牢骚，动了返南洋的念头。我每天注意看报纸，读着北方的战况，希望能找个机会去陕北；也想乘长江船到武汉找董冰如老师，但又怕去了扑空。刚到南京

曾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却如石沉大海。我忽然感到回到祖国不如在南洋好混。在菲律宾，我 14 岁就从这个岛到那个岛，只要有华侨的地方，只要肯卖力气，不怕没有饭吃。我还在菲律宾人家中住了半年，受到很好的款待。这些经历，养成了我盲目自信和冒险的精神。但是在南京一个月，到处碰到冷冰冰的脸孔，离开钞票寸步难行，而身上的钱又快光了。一般学校每学期学杂费几十元，加上膳宿费得 100 多块，家里肯定供给不起。想做工找不到合适的地方，想救国没有门路……炎热的气候增加了心里的烦闷。

8 月初的一天，陈同学忽然跑来说，南京很快要打仗了，他们学校要疏散，他决定回南洋，问我们怎么办？同屋的两位都主张回去。南京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也同意一块回厦门，再做打算。

就这样，我们离开南京到上海。上次经上海没有歇脚，这次都想看看这个大都会。我们在北站一家旅店住了几天，逛了南京路，游了外滩，进了“大世界”，饱览了五光十色的大上海。临走前一天，我们到蓬莱大戏院观看话剧《卢沟桥之战》，记得演员里有崔嵬、舒绣文和田冲等。

8 月 12 日上午，我们从外滩坐舢板到浦东，登上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。船上人山人海，甲板上、帆布棚顶挤满了人。黄浦江边，中国士兵正在修工事；黄浦江里，停泊着几十艘日本军舰。战火快烧到上海滩了！果然，我们船行到浙江海面，听无线电广播：“八·一三”上海抗战爆发了！

望 延 安 路 途 遥 远

回到厦门，我考上集美初中三年级。集美中学是陈嘉庚先生办的，学生大部分是南洋的侨生，不要学费，每月只收 4 元膳费。我想上完初中不成问题，总比无所事事好些，搞张初中毕业

文凭，也许日后有用。

开学不久，日寇空袭厦门，威胁到隔海的集美。学校迁到安溪县文庙里，许多侨生纷纷回南洋，我跟着到安溪。福建地处海隅，与内地交通不便，消息不灵；安溪在群山之中，更是闭塞，只能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北方抗战的新闻。偶尔接到香港的刊物，看到八路军打鬼子的消息，同学们争着传阅。有一天，吴其进同学收到一本《群众》杂志，有一篇延安抗大生活的通讯，还登着招生简章。读过后，我的心立刻飞向延安，决定初中毕业，无论如何也要到陕北去。

我试着寄封信到汉口给董冰如老师，不敢公然提到延安去，只说毕业后要上北方参加抗战。真令人高兴，居然收到复信，大信封上印着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”一行红字，复信中叫我到陕北去。我反复读了信，更坚定了去延安的决心。解放后我才知道，董老师当时在周恩来和郭沫若同志领导下的第三厅工作。

那时，福建泉州驻军旅长钱东亮，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侄儿。钱东亮在泉州各县横征暴敛，鱼肉乡民，抽壮丁，敲竹杠，老百姓叫苦连天。1937年寒假，我回到家乡，将见闻写了一篇《国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》的通讯，寄给汉口《全民周刊》。1938年5月，文章登出来，我还没有见到。

有一天，李法西同学悄悄问我：“汉口杂志登了一篇骂钱东亮的文章，是你写的吧？”李法西原是菲律宾侨中的同学，我用的笔名“王爽”，又是在菲律宾用过的，只得点头承认。他说：“钱东亮正在暗中查访，你要当心！”

我写文章时出于义愤，有点“牛犊子不识老虎”，经他提醒，真有些后怕。想起厦门某报记者曾尤先生，发表一篇《暴风急雨话泉州》，被迫逃往香港，我把钱东亮骂得狗血淋头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怎肯与我干休？我不禁暗中捏了一把汗。

暑期毕业考试结束，我匆忙回故乡。路过泉州，到生活书

店，问有没有新到的《全民周刊》？售货员端详了我一阵，从柜台下取出 1 本说：“总共只来了 5 本，这是最后 1 本了，要好好保存！”我付了款，感谢他的好意。

回到家里，匆忙阅读 3 月前寄出的文章，心情十分激动。同乡一位女教师来了，她曾在泉州参加过妇女军训，文章的部分材料是她提供的。她说钱东亮大发脾气，命令追查谁写的文章，让他查到就要命！她叫我赶快离开福建。

福建禁止壮丁出境，我当时 19 岁，正是被禁之列。形势不容久留，又不好明言，我只告诉父亲要去汉口找老师，对其余人说要回南洋。父亲手头拮据，拿不出多少钱来，嫂子拿出一只金耳坠助我作旅费。临行那天早晨，父亲亲手给做了一碗面线，送我到汽车站。我觉得父亲太好了，此番出门，不知何日再见，汽车开动时，止不住流下眼泪。没想到这次分开，竟成了生离死别。

这时厦门已被日军占领，要去香港只能在泉州湾乘英国船。由于逃港的难民太多，港英当局规定，只许乘头等、二等舱的旅客上岸。我只好买去汕头的统舱票，到汕头再想法去香港。我姐姐一家在九龙避难，必须找姐姐资助，否则去不了陕北。

船到汕头，我在潮阳过夜。第二天乘长途汽车到惠阳，第三天到樟木头，转乘火车到九龙。在姐姐家中住了几天，筹足了旅费起程。在广州遇到集美同学林有声，他和陈耕国、李金发两位同学，在文德南路租了一间楼房，邀我搬去同住。他们也想去延安，因为陈耕国得急病住进中山医院，把旅费花光了，正等南洋的汇款。前几天李金发接到汇款，已经先头出发了。

广州经过日寇大轰炸，有钱人纷纷逃往香港。人去楼空，房租很便宜。我们住的二层楼，每月只花几天的租金，其实是给房东看房子，所以有时就赖着不付钱，而且唱起电影《十字街头》中的插曲：“没有钱也得吃碗饭，也得住间房，哪怕老板娘，做

个怪模样，郎里格郎……”

同楼住着一个青年救国团体，经常邀我们一块上街做宣传工作，我们闲来无事，当然乐意。大家用广东话唱着《武装保卫大广东》、《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》等歌曲，向围观的群众宣传抗日的大道理，有时还演街头剧。

两位同学写信向家里要钱，说要回南洋，家里似乎也发现了什么，迟迟不汇款，一直等到9月下旬，才把钱寄来。我们急忙到东山百子路八路军办事处，开了一张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介绍信，立刻动身去汉口。日寇正在包围大武汉，敌机每天来空袭，听到警报，市民们成群拥往租界。我们在广州司空见惯，对敌机满不在乎。我找到永安堂药房，想会见董冰如老师，太不凑巧，他去广州了，真让人失望！

我们往西安进发，火车开到河南明港，忽然停住不走，传来日本骑兵到了驻马店的消息，大家都焦急，幸好敌人很快撤走了。后来听说，敌军第二天便切断平汉线，我们是最后一班客车。沿平汉线各车站，都有小贩卖食品，烧鸡每只1毛钱，我们贪便宜，拿烧鸡当饭吃，把肚子都吃坏了。火车从郑州开往西安，上来很多大兵。车厢里有3位湖北姑娘，挨近我们的座位，看到几个兵痞挑逗她们，其中有个姑娘叫钟国权，有意把我们当卫士，不断和我们说话，一来二往，慢慢熟悉起来。我们义不容辞，一路照护她们。到了西安车站，钟国权给了一张纸条，写着她们的住址和电话，邀我们去作客。

出站以前，几个“丘八”查完行李，拼命盘问我们。我们藏起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，异口同声说是到西北联合大学读书，没有露出破绽，才让我们出站。

次日上午，我们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，接待人员要我们等候编队，还说从西安到延安，没有汽车，要徒步行军，叫我们尽量轻装。

在旅社等候通知，闲来无聊，给钟国权打电话，3 位姑娘一阵风似地来了，坐了一会，热情地请我们去作客。她们住在亲戚家，西北实业公司的后院，一座阔气的楼房。女佣人倒茶时，呼三姊妹“小姐”，称我们“少爷”。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称呼，感到很刺耳。玩了一阵，起身告辞，钟国权和两位堂姊妹，坚决留我们吃中饭，说是为了答谢一路的照顾。萍水相逢，盛情难却，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。下午她们又请去看电影，片名《王老五》，是部低级趣味的片子，由韩兰根和蓝苹（江青）主演。

以后几天，三姐妹天天到旅社来玩，有时出去逛马路，看电影，下小馆。从钟国权口中，我知道她父亲叫钟相毓，是国民党洛川专员。我告诉她要去延安抗大上学，她表示有机会也想去陕北。临走那天，三姐妹来送行，钟国权交给我一封信，要我到洛川亲自交给她父亲。

第一课：八百里行军

从西安到延安，徒步行军 800 华里，是我们未进抗大先上的第一课。

编队那天上午，八路军办事处发给每人一套灰色的棉军装，一顶带护耳的棉帽，一个八路军学兵队的符号，一个青天白日帽徽，听说这些都是国民政府发下的。阳历 10 月初旬，天气还很热，我们几个华侨青年，生来未穿过棉袄，着上棉衣棉裤，顿时汗水淋漓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只得脱下长袖衬衫，留着背心裤衩，套上空心棉衣，仍止不住冒汗。我把不急用的东西、衣服、西药、几本厚书，都“轻装”了，干脆连两件长袖衬衫，也塞进小藤箱里，一古脑送给办事处。

我们这队学兵 30 多人，都是 20 多岁的青年。一个东北军的军官年纪最大，也不过 30 岁。临时指定的队长，身材魁伟，相

貌堂堂，是个东北流亡学生，满口关东腔，喊起口令很在行。队里几个女兵，有四川人、广东人，也有娇滴滴的上海姑娘。大家来自祖国各地，说着不同口音，但是心情一样：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，准备和日寇血战到底！

编队、换衣服、轻装、买上路用的物品，搞了一个上午。下午出发，大家穿着新军装，头一天当上八路军，成为革命战士，心里都格外高兴。队伍向城外开拔，踏着整齐的步伐，唱着救亡歌曲，一个个劲头十足。只是谁也不会打背包，手里提包袱，有点不大相称。

西北是大陆性气候，早晚凉爽，午后燥热。出了西安古城，人人汗流浹背，个个喘着粗气。队伍开始乱了套，有的掉队拉距离，有的敞开上衣，有的摘掉军帽，有的脱下棉裤，穿着杂色的长裤……我的身上像开了河，汗水从额头流到脚上，棉衣裤的里子全湿了，贴在身上，又厚又沉，像戴着枷锁，恨不得扒掉棉军装，穿着背心裤衩走路，又怕不雅观。后来看到有的女同学，把棉裤搭在肩膀上，只穿条红裤衩，也就走到路旁，脱下棉裤，穿上一条打球穿的红条条的灯笼裤。我不由庆幸这条长裤没有“轻装”掉，暗暗懊悔送掉了长袖衬衫，责怪自己是个傻瓜蛋！

看着这群吊儿郎当、稀稀拉拉、像打了败仗的队伍，队长急得喊来喊去，谁也不听他嚷嚷。开始他还憋着一身汗，连风纪扣也不解开，慢慢也脱下棉帽，敞开衣襟，棉裤始终穿着，看来他比大家有锻炼。

大约走了 30 里，天已黄昏，前面是草滩镇，去延安的第一站。队长宣布休息，要求大家整好军容。我们列队进入街市，费了很大工夫，找了旅店，包饭住宿。

第二天清晨，刚集合队伍，突然来了十几个国民党兵，为首的军官宣布要检查。队长不同意，说都是抗日军，现在国共合作，应该团结抗战。那军官坚持要检查，说是上面的命令。我们

都很气愤，认为中央军有意刁难，制造磨擦。可是人家有枪，只好忍气吞声。一个士兵拿走我的南洋护照，交给那军官，那军官看到护照上的外文姓名与胸前八路军学兵符号上的不一致，便大做文章，要将我扣留。我再三解释，许多华侨都有两个名字，又对他讲了团结抗战的道理，说我们千里迢迢回到祖国，为着打日本鬼子，应该得到同情帮助才对。那军官似乎有所感动，把护照还给我。

以后几天都很顺利，到了耀县又遇到麻烦。那天轮到我打前站，我挑着行李来到耀县南门，两个哨兵检查行李，翻出一本红皮书《在西班牙》，问我是什么书？我说是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书。两个不识字的大兵，哪知道地球上有个西班牙，只认为红皮书一定是宣传赤化的危险书，把我带到县政府，交给一个什么科长。那科长衣冠楚楚，翻了翻《在西班牙》，客气地请我坐下，盘问完我的来历，说道：

“你是华侨学生 打起仗来为什么不回南洋？”

我说：“自从‘九·一八’日本强盗占领东三省，外国人瞧不起中国，华侨在海外很受气。有血性的中国人，谁愿意当亡国奴？我回祖国就是为了打日本，现在全面抗战了，怎能跑回去当逃兵？”

他问：“想打日本 到处都有军队 为什么不参加中央军？”

我说：“八路军打鬼子打得漂亮，平型关一仗歼灭鬼子一个旅团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所以我要当八路军。”

他不高兴地反问：“中央军保卫大上海，徐州会战，不也打得很漂亮吗？八路军打胜仗是他们宣传的，其实是游而不击。”

我反驳说：“平型关打胜仗，阳明堡烧日本飞机，都登在政府的报纸上了 怎能说游而不击？”

他语塞了 强词夺理地问：“你是共产党吧？”

我说：“我是个爱祖国的华侨青年。”

他问：“你不是共产党，为什么非到延安去？”

我道：“蒋委员长说过，抗战是地无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，现在是国共合作，我愿意去延安，你们不应阻拦！”

他说：“不是阻拦，是忠告！延安很苦，连小米饭都吃不饱，你们华侨吃不了那样的苦。”

我说：“我回国抗战，决心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，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苦呢？”

他装出一副笑脸说：“钦佩，钦佩！精神可嘉！不过我还是劝你到中央军好，像你这样有志的青年，到中央军，一定大有作为。附近就有中央军，你愿意去，我可以推荐。”

我也客气地说：“谢谢！我已经当了八路军的学兵，不能半路开小差。”

当时国共磨擦刚开始，国民党还不敢那样放肆。那科长看到我铁了心去延安，只好作罢。后来听说，许多去延安的革命青年，半路被国民党军队扣留，送到集中营受反共训练。我算幸运，没有落入他们的魔掌。

从耀县北行，经铜川、过宜君、到黄陵，站在传说中的黄帝陵墓前面，我不由想到：四万万黄帝子孙，正为捍卫祖先开拓的土地，赶走日本侵略者而战斗！假如黄帝有灵，应在九泉含笑。

行军到洛川，进入陕甘宁边区。城里住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也住着国民党的专员公署。想起钟国权的嘱托，我拿着她的家书，走到专员公署。站岗的国民党兵不让我进衙门，我对哨兵说，我是给钟专员捎家书来的。哨兵不敢怠慢，立刻领我到传达室。传达室的老头看了信皮，满脸笑容，请我坐下，连忙到里面通报，不一会儿出来说：“专员有请！”我随他穿过大堂，进入后院。只见一个 50 多岁的胖子，穿着咖啡色哗叽的中山装，微笑着从里屋走出来，老头说他就是钟专员。

钟相毓抬起右手说了声“请”，把我让进客厅坐下，亲自倒

上一杯茶，又递过来一支烟。

“谢谢，”我说；“我不会抽烟。”

“请喝茶。”他说着，自己点上香烟。

我端起茶杯啜了一口，显得很拘束。钟相毓客气地说道：

“小女们一路多蒙照顾，实在感激。”接着咬文嚼字地问：“府上哪里？”令尊令堂健康否？”贵庚几何？”……我一一回答过。他又问：“不知老弟到延安后作何打算？”

我说：“到抗大求学，毕业后上前方打鬼子。”

“难得，难得！”他恭维过，脸上笑容消失了。沉默片刻才开口：“到延安看看也好，他们宣传得厉害。”停了一下又说：“老弟人才出众，前途不可限量，日后当能鹏程万里，奋翼高飞。老弟到延安后如不合尊意，欢迎到敝处来。小女信里说，你对她很好呢！”

听了后面一句，我的脸有点发烧。由于一向讨厌国民党官员，尽管他是钟国权的父亲，对我客客气气，给我戴了高帽子，好像在为我的前途着想，也排除不了我的戒备心。从他的恭维话里，我听出了弦外之音，觉得气味不对，寒暄几句，起身告辞。

他挽留我说：“天快黑了，请用点便饭再走吧。”

我推托说：“队里有纪律，不好随便在外面就餐，谢谢了。”

钟相毓送我到衙门口，那个哨兵有点惊奇，慌忙举起右手放在步枪筒上，向我行一个军礼。

到延安以后，我曾给钟国权写信，希望她能来陕北求学。由于我们很快转到陇东，未能收到回音。1940年，我在山东敌后编报，收到一则新华社的电讯，洛川人民将顽固专员钟相毓驱逐出境。

离延安 西出陇东

走了十几天，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！

早晨，队长宣布最后一天行军，要求大家注意军风纪。下午，太阳偏西的时候，走在前面的同学，突然欢呼起来：

“宝塔山！”延安到了！”胜利了！”……

我走到公路的高处，眺望着延河东岸的宝塔山，西岸的延安城墙，心里激动万分，盼望一年多的目的地到达了！平生第一次长途行军胜利了！辛苦和汗水化为欢乐，止不住眼里闪着泪花，内心里呼喊着：“延安！我的母亲，远方的游子来到你的身边了！”

休息 10 分钟。同学们擦干脸上的汗水，打掉身上的灰尘，整理服装站好队。队长喊着“齐步走”，队伍里唱起《抗大校歌》，走进古老的城门：

黄河之滨，集合着一群，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；人
类解放，救国的责任，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……

延安城里十分热闹，街道两旁摆着一处处货摊，羊肉汤锅里发出诱人的香味，行人熙熙攘攘，小贩们喊着招揽生意。我们兴奋地走着，好奇地东张西望。天刚黄昏，有几处小摊点亮了电石灯，夜市开始了。

晚上，我们被安置在几间空店房里，没有门窗，没有被褥，铺板上只有一点谷草。我们 3 个侨生，每人在汉口做了一件夹大衣，一路上用它当被子。行军时嫌累赘的棉军服，夜晚成为挡风御寒的宝贝。

翌日上午到校部报名填表，表格两旁印着对联式的口号，原词记不住了，大意是：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，要如实填写自己历史；是抗日救国革命青年，不隐瞒家庭出身成份。办完入校手

续，我们3人游览了古城。城圈不大，街道不长。用石灰水刷写的抗日标语，随处可见；雄壮的救亡歌声，响彻云天。一队队八路军健儿，踏着整齐的步伐；一群群爱国青年，露出欢乐的笑脸……到处热气腾腾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，古城变年轻了！我们特别感兴趣的，是城外那些从黄土山边开出的窑洞，听说里面冬暖夏凉，许多抗大同学都住在窑洞里，大约我们也可以进这种别致的宿舍里享受一番。

初到延安，吃不惯小米饭，咽不下干馒头，口袋中还有余钱，可以下馆子吃蛋炒饭，上街头喝羊杂碎汤。最难受的是没有地方洗澡。行军十几天，每天一身汗水，衣服湿了又干，身上一股酸臭味。找不到澡堂，只好到延河里洗身。这天晚饭后，我们3个“南蛮子”，跳进冰冷的延河中游泳。穿着棉袄、披着大衣到延河边散步的男女同学，围在岸上观看，互相议论着，大概说我们是疯子。我们只顾洗得痛快，哪管别人说三道四。

外地青年陆续到延安。有一天，通知我们开会，200多新生坐在大院里，一个中年人给我们讲话。他身材细长，上身穿着单军装，外面套着敞开衣襟的棉袄，下身穿着马裤，头戴一顶红军帽，脚踏一双布条编的草鞋，走路一瘸一拐。司仪介绍，他是何长工同志，法国留学生，井冈山时代的老革命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，他的跛脚就是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负伤的。现在是我们的大队长。同学们听了，都不禁肃然起敬。

何长工同志宣布，从今天起我们编为抗大第五大队。由于延安地方小，抗大四大队在洛川，五大队要到甘肃庆阳建校。陇东比延安好，牛羊猪肉很便宜，白面馍馍吃不完。他讲话很风趣，煽动力强。他还当场用法语唱了《马赛曲》，同学们听了都很兴奋。

200多新生编成两个队。我编在第一队，被选为副班长，林有声和陈耕国编入第二队。去陇东的前一天，队里有个从马来亚